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传播研究

——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为例

幸子依

(¹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文化基因载体,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为案例, 通过参与观察发现: 多民族青少年通过乐器接触唤醒文化记忆、协作演奏培育交往能力、创新传播重构文化符号, 形成“认知-情感-行为”三维认同转化机制。音乐实践促使青少年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传播主体, 借助音乐符号的共享与转译, 促进跨民族情感共鸣与文化互嵌, 为新时代共同体意识建构提供了艺术实践路径。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音乐; 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编号: 2025SYJSCX12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45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与文化多样性交织的当代语境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本研究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为样本, 揭示民族音乐传承如何通过符号整合、实践参与与仪式互动, 推动各民族青少年从文化认知到情感归属的深层转化。民族音乐作为活态文化编码系统, 其器乐符号的跨文化整合突破了单一民族的文化边界。例如乐团作品《丝绸之路》中, 古筝与箜篌的音律调和不仅呈现五声音阶与波斯调式的交融, 更隐喻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琵琶形制从曲项到直项的演变、技法从轮指到扫弦的融合, 印证了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理论, 展现外来文化在中原涵化中既保留异域特质又生成新审美范式的动态过程。这种器乐符号的互鉴共生, 使音乐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桥梁。在音乐创作的当代性转化中, 民族音乐通过“文化基因提取—情感意象重组”的内在逻辑, 构建超越民族界限的音乐话语。作曲家赵季平的《庆典序曲》以西南少数民族芦笙舞曲的复合节奏为基底, 融入秦腔苦音调式的悲怆苍劲, 通过多声部对位形成既具地域特色又超越民族界限的音乐表达。芦笙特有的“三拍短促”节奏型与汉族锣鼓“紧打慢唱”技法的呼应, 在节奏张力中隐喻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青少年在演绎此类作品时, 既需掌握不同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 又需理解音乐语言背后的文化叙事, 这种双重学习过程使其自然浸润于多元一体的文化语境。

从社会实践层面观察, 民族音乐的集体演绎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生成仪式。对55位乐团成员的深度访谈发现, 青少年在合奏实践中经历三重认同转化: 初始阶段的乐器认知差异使其意识到文化多样性, 中期的声部协作磨合理解差异共存的艺术规律, 至后期的情感共鸣升华形成集体归属意识。这印证了塔菲尔社会认同理论中“群体比较—积极区分—群体偏好”的心理机制。一位回族团员谈及古筝与热瓦普合奏时感悟的“和而不同”, 正是共同体意识在微观实践中的具象化呈现。演出仪式通过传统服饰穿戴、乐谱符号解码等程式化行为构建情感聚合场域, 例如《茉莉花》经马头琴诠释时, 多民族演奏者的生物节律同步现象, 揭示了文化认同向身体记忆的渗透。观众掌声构成的群体符号反馈, 则将抽象认同转化为可感知的“我们”共同体想象。乐团的创新价值还体现在构建

作者简介: 幸子依 (2000-), 女,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硕士 (在读), 研究方向: 民族音乐学。

“专业排练厅+非遗展演空间+线上云合奏”的三维传承生态。非遗大师工作坊使青少年亲炙维吾尔族木卡姆、彝族月琴等濒危乐种的活态传承，数字化平台探索民族音乐在虚拟空间的表达可能，代际协同机制则平衡了技艺传承与文化创新。这种立体化模式使民族文化从静态标本转为可触摸、可创造的“生命体”，推动青少年从文化消费者向传播主体转变。研究表明，当多民族青少年在共同艺术实践中解码文化符号、参与集体仪式时，差异化的文化身份得以在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叙事中整合。这种文化实践路径不仅为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培育提供范本，更从学理层面揭示了符号互动、身体实践与情感能量在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协同作用。后续研究可拓展至不同地域与代际群体的比较，以深化对文化认同机制情境特异性的理解。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多元实践路径

（一）器乐符号的跨文化融合：重构文化记忆共同体

民族音乐传承，从本质上讲，是文化符号的活态传递进程。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表明，器物与仪式作为记忆的载体，能够借助象征性实践突破时空限制，构建起群体的身份认同。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对《丝绸之路》等作品的演绎为例，在该作品中，汉族古筝与西域箜篌、琵琶展开跨文化对话。二者在音律层面存在差异，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然而在《丝绸之路》的旋律叙事里却达到和谐统一。这两种乐器的音色碰撞，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运用“音色蒙太奇”手法（勋伯格音色旋律理论的在地化运用），重新构建了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图景。

在针对乐团成员的访谈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83.6%的受访者表示，通过合奏训练，他们理解了乐器背后的文化交融历史。一位哈萨克族团员谈道：“在演奏冬不拉时，老师会对比它和汉族三弦的共鸣箱结构差异，而进行合奏时，两种乐器能够像对话一样相互交织。在这一刻深刻意识到，差异本身也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这种认知转变，恰好印证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文化杂糅性”的理论洞见——文化身份并非静态的本质存在，而是在动态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关系性存在。

（二）音乐语言的创造性转化：构建超民族话语体系

民族音乐的文化整合，不应仅停留于表层元素的简单拼贴，而需深入至深层的意义生产系统。作曲家赵季平在《庆典序曲》中以西南彝族芦笙舞曲特有的复合节奏型（3+2+2）作为核心动机，运用模进、倒影等复调技术，将其解构为十六分音符群，并与秦腔苦音调式中微降 si 与微升 fa 构成的特性音程进行多声部对位。这一创作手法，暗合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修补术”（bricolage）概念，即把不同文化系统的“碎片”重新编码，从而生成全新的意义结构，从听觉层面隐喻了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

这种创造性转化在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形塑方面，发挥着尤为显著的作用。研究表明，当团员演绎《庆典序曲》时，需要同时掌握芦笙的律动感与秦腔的悲怆性表达。这一双重技术习得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知的具身化（embodiment）训练。多民族音乐语言逐渐内化为青少年的文化感知图式，使他们在无意识中认同“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一位汉族团员在访谈中表示：“以往觉得彝族音乐十分遥远，然而在练习《庆典序曲》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节奏与汉族的锣鼓经在表达对生命的热情这一情绪上，存在某种共通之处。”

二、民族音乐文化在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中的传播路径

（一）人内传播的认知基础作用

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作为传播活动的元初形态，构建起个体认知建构的基础性机制。在乐团实践过程中，乐手要历经三重认知转化。首先是对音乐文本的符号解析，也就是将乐谱呈现的视觉符号转换为听觉意象；其次是对技法系统的具身认知，例如二胡演奏时，指法序列与弓法力度所形成的肌肉记忆；最终实现情感体验的移情内化。

以演绎《二泉映月》为例，演奏者需要通过对历史文化情境的想象性重构，把阿炳的个体生命体验转化为弓弦震颤所传递的情感表达。此过程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的同化——顺应机制相契合，即外部音乐信息借助个体认知图式的调整，达成文化的内化。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显示,音乐信息的处理需要大脑听觉皮层、前额叶与边缘系统的协同运作。当青少年乐手进行乐曲诠释时,其镜像神经元系统会激发对音乐情感的具身模拟,这种神经层面的传播机制为人内传播提供了生物学依据。与此同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揭示了身体在音乐认知中的媒介作用——演奏者的肢体动作不单单是技法的承载,更是文化记忆的具身化呈现。

(二) 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建构机制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在文化传播中占据枢纽地位,于民族音乐传承进程中呈现出双重交互特性。一方面,它充当着个体认知向群体认知转化的中介系统;另一方面,它成为传统文化符号进行现代转译的实践场域。传播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认为人际渠道在文化传播中具备信息传递与关系强化的双重功能。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传播实践,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框架。其人际传播网络借由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这两个维度,搭建起一个动态的意义协商系统。

在物理场域的传播实践中,乐团构建起基于具身互动的“表演-反馈”闭环系统。音乐演奏可看作是一场精心筹备的“前台表演”。演奏者借助声学符号,如旋律、节奏,以及视觉符号,像表情、肢体语言,来开展文化展演。而观众则通过“非语言反馈集群”,包括掌声强度、身体律动频率、面部表情等,形成即时的传播效果评估指标。当演奏者则会依据观众呼吸节奏的同步程度来调整乐句处理,从而实现临场性的意义共建。即传播双方通过符号交换持续重构传播情境。

随着这数字媒介的融入催生了“技术中介化人际传播”这一新范式。乐团在网络平台构建的传播矩阵,本质上是传统人际传播要素在赛博空间的拓扑变形。从平台数据来看,6460次点赞不仅是审美认同的量化指标,更是社交资本积累的符号货币。评论区的3055次推荐则形成“弱连接”(weak ties)传播网络,这种数字人际传播所产生的涟漪效应,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突破地理边界,实现跨圈层传播。

在传播效果方面,双重场域的人际互动形成了文化认同的强化机制。线下音乐会带来的“共在体验”(co-presence)能够催生情感共同体,线上传播留下的“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则构建起持久的意义网络。这种虚实交融的传播生态,不仅实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代际传承,更借助青年群体的创造性参与,推动传统文化符号向现代性转化。正如传播学者卡斯特所指出的,在网络社会中,文化传播已演变成“多重传播流”(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flows)的复杂互动过程,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实践正是这一理论范式的生动例证。

(三) 群体传播的场域中介功能

群体传播(group communication)作为文化传承的场域转换机制,在传播层级中发挥着结构性中介作用。根据库尔特·勒温群体动力学理论,群体传播通过“社会力场”(social forcefield)的形塑,实现个体认知向集体意识的范式转换。

在乐团内部传播系统中,指挥家担任着文化转译的中介者角色。指挥通过专业权威将音乐文本转化为多模态符号指令:其手势语汇构成视觉符号系统,语言阐释形成概念符号体系,示范演奏则生成听觉-动觉复合符号。例如在处理《庆典序曲》时,指挥对弦乐声部做出的“抛物线手势”,既传递力度渐变的物理要求,更隐喻时空流动性。这种群体传播过程实质是音乐文本的立体化解码,使个体乐手的认知图示整合为群体性的音乐叙事。

在公共文化展演场域,乐团与观众群体构建起“符号交换共同体”。参考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音乐会现场形成临时性的文化对话空间。当《康定情歌》旋律响起时,观众群体通过身体共鸣(同步律动)、声音反馈(集体哼唱)构建起具身化的传播仪式。这种群体互动产生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通过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得以解释——集体兴奋度的提升促使音乐符号突破审美范畴,演变为文化认同的强化剂。

数字媒介时代,群体传播呈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场域”特征。乐团在短视频平台构建的虚拟粉丝社群,通过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效应形成文化认同强化机制。数据分析显示,关于民乐合奏视频的群体讨论中,73%的弹幕内容涉及地域文化认同,形成数字时代的“新口头传统”。这种虚拟群体传播既延续了传统口传文化的集体记忆功能,又通过数字痕迹的永久存续,构建起文化传承的新型档案库。

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实践表明,当代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已演变为多层级、跨媒介的场域互动系统,其中

群体传播承担着文化基因重组与价值范式转换的关键功能。

（四）大众传播的范式重构效应

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作为文化传播的顶层架构，在现代社会已演变为具有认知框架重构能力的生态系统。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大众传播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三重范式重构功能：认知引导、时空突破与符号嬗变。

在认知引导维度，大众传播构建起“媒介化认知框架”。乐团通过四川卫视《文化天府》栏目的专题报道，将专业音乐语汇转化为大众文化符号。传播效果监测数据显示，节目播出后“民族乐器学习”的百度搜索指数环比提升127%。

时空突破层面，数字化传播矩阵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时空脱域”（disembedding）。乐团在微信平台建立的官方账号，运用“短视频+直播”的混合形态，将剧场艺术转化为可存储、可复制的数字产品。平台数据显示，总计收到6460次点赞、2314次转发、3055次推荐、130条评价。

在符号嬗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引发音乐文本的“超真实”（hyperreality）转化。当电视媒介对音乐会进行技术重构时，多机位剪辑、特写镜头和环绕声效共同构建起波德里亚所谓的“拟像世界”。例如对古筝演奏手部的显微拍摄，将技法细节放大为视觉奇观，使音乐接受从听觉主导转向视听综合感知。这种媒介化改造催生了新的审美范式，传统音乐的“韵味”（aura）在本雅明意义上被技术复制品取代，形成机械时代特有的文化消费形态。

该传播模式的文化意义在于，它通过媒介技术的赋权效应，使传统音乐文化获得现代性表达。当彝族月琴演奏通过4K超高清技术呈现时，不仅实现了文化保存的数字存档，更在视觉政治层面重构了民族文化的当代形象。这种传播范式的转型，实质是传统文化在媒介社会中的适应性进化，其终极价值在于构建起连接文化记忆与未来想象的传播桥梁。

三、民族音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及意义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通过符号化实践构建起青少年民族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音乐即文化”理论框架揭示，音乐行为本质上是特定文化系统的仪式化展演。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中青少年参与的民族音乐活动，实际上在进行多维度的文化认知建构：器物层面对民族乐器的具身认知、制度层面对音乐组织的规则内化、精神层面对文化价值的符号解码。

当青少年接触羌笛、月琴等民族乐器时，其既有认知图式（schemata）面临新文化元素的冲击，通过乐器形制的触觉感知与演奏技法的身体记忆，逐步实现认知结构的重组。这一过程印证了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的核心主张——认知发展依赖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体验。

在集体音乐实践中，青少年通过“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体验完成共同体意识建构。乐团排演的《阿诗玛叙事诗》等融合多民族音乐元素的作品，形成巴赫金所谓的“复调文化空间”。彝族月琴的悠扬、藏族弦子的律动、蒙古族呼麦的浑厚，在复调结构中既保持民族特性又形成和声共鸣。这种音乐形态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隐喻着费孝通“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理论，使参与者在音乐协作中直观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底。

这种认同建构的深层意义在于，它通过审美体验完成了政治认同的感性转化。当蒙古族马头琴的苍凉音色与汉族古筝的清越之声在合奏中达成和声平衡时，音乐本身就成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理念的声学隐喻。这种非说教的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方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身化的实践路径，印证了霍耐特承认理论中“文化承认”对共同体建构的基础性作用。

结语

民族音乐文化的现代传播机制及其在认同建构方面的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民族音乐借助器物接触、仪式参与以及符号解码这三条路径，在青少年群体中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文化坐标体系。量化数据清晰显示，持续参与音乐实践活动的青少年，其共同体认同指数得到显著提升，有力印证了音乐濡化对身份认同所具有的形塑效能。民族音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将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可切实感知的审美体验，通过声学隐喻实现政治认同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化，有效突破了传统教育单向灌输的固有

模式。

在全球化与数智变革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机制。民族音乐持续发挥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作用，在守正创新中赓续文明基因。

参考文献:

- [1]陈育宁.中华民族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3(06):1-5.
- [2]高向东,高鹏飞.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创新举措:民族互嵌格局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5):116-124.
- [3]郝天宇,李如彪,韩国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暨第十五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综述[J].民族研究.2021(05):134-135.
- [4]谷春香.突破心理习得性无助效应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J].教书育人(教师新概念).2020(07):29.
-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3-113.
- [6]卫亦芸.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背包客亚文化传播研究[D].山西大学.2016-01-01.
- [7]张超.基于5w模式的农村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5-01-01.
- [8]王融.高校学生网络舆情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分析[J].才智.2017(24):116.
- [9]张天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研究:基于传播学视角的考察[D].浙江海洋大学
- [10]张庆芳.中职语文课堂练习研究[D].苏州大学 2010-03-01.
- [11]于斯瑞.低音提琴独奏《草原之歌》的表演诠释[D].内蒙古大学 2019-12-01.
- [12]李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播与传承的有效路径——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与传承》[J].科技与出版.2024(10):49.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Ethnic Mus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he Chengdu Youth Ethnic Orchestra

Xingzi Yi

¹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As a carrier of the genetic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folk music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study, using the Chengdu Youth Ethnic Orchestra as a case, found that multi-ethnic youth awaken cultural memories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musical instruments,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and reconstruct cultural symbols through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thereby forming a three-dimensional mechanism for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cognition-emotion-behavior". Musical practice encourages youth to transition from cultural consumers to communicators, and through the sharing and translation of musical symbols, promotes emotional resonance across ethnicities and cultural embedding, providing an artistic path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lk music; cultural identity